

在占统治地位的精英传统内部,也存在着不同的元素,它们对暴力行为的看法较为善意。这些元素包括暴力小说的传统,如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,对英雄的崇拜,如岳飞;以及对于武术的研究。

读+:儒家传统在麻城如何被对待和利用的,与暴力有何关联?

罗威廉:像中国其他地方一样,麻城以它自己的方式体现着儒家传统。据我所知,麻城大多数家庭遵守《朱子家礼》。

县政府所在地有一所漂亮的孔庙,地方官员依礼进行春秋祭祀。父系宗族有祠堂宗庙,进行祖先祭祀,是当地主要社会组织结构。当地有对科举考试成功者的令人尊崇的记载。

而且,在16世纪晚期,当耿定理、李贽和周氏兄弟活跃在麻城时,它成为整个帝国儒家思想最活跃的中心。所有这些都没能阻止暴力行为的持续发生,甚至其中一部分,如宗族争斗和李贽的激烈思想,对暴力的发生还有推动作用。

读+:信奉儒家传统的人,同时也嗜用暴力,在麻城有哪些实例?

罗威廉:麻城的暴力跟平民有关,跟精英也有关。举两个例子,梅国桢,晚明时期一个有高度修养的儒家学者,曾经采取非常暴力的手段镇压底层谋反。夏斗寅,20世纪一个军阀,自视为传统精英文化的守护人,是本县历史上最野蛮的暴力镇压者。当然,贵族地主一贯运用强制和暴力手段来保证奴仆的顺从。

人类社会的暴力一直很普遍

读+:相较麻城的暴力,你如何看待西方奴隶制、殖民扩张和法西

斯主义的暴力？

罗威廉：近代早期及近代中国乡土社会可能和西方一样暴力，不见得更暴力。西方一再发生的农民战争，宗教战争，宗教法庭，纳粹大屠杀，还有一战时欧洲发生的大屠杀，至少也跟中国人经历的暴力同等。美国对北美土著人的种族灭绝和可怕的黑奴制度，也是同样坏的，甚至更糟。

读+：中国和西方学者是如何看待对方社会存在的暴力的？

罗威廉：在《红雨》中我并不是要说明中国是一个特别暴力的社会，我只是想说，中国不见得比诸如欧洲或北美之类的历史上的社会更少一些暴力。因为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强调社会和谐，许多西方历史学家就误以为这种说辞是对中国现实的准确描述。

这种看法可能有部分的正确性。比如我过去的书把汉口描述成一个社会和谐规约比较强的地方，把陈宏谋描述为一个献身于公共利益的和平人士。这些刻画本身未必有错，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是一种片面的描述，需要一些纠正。

我还感觉到，不知怎么的，中国人对西方学者将他们描述成消极顺从、被动、守法的形象感到是一种侮辱，认为贬损他们跟西方人相比缺少一点“男子气概”的攻击冲动。我的这本书就是试图弥补过去这些不全面的描述。



茅海建

华东师范大学教授。

2014.4.1

茅海建： 张之洞差点改变了“戊戌变法”

刘功虎

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位于北京紫禁城西华门内，茅海建是那里的常客。

长期以来，对于戊戌变法的原委，人们多以康有为、梁启超留下的史料为基础，构建成基本的叙事结构和大众认知。而今人们渐渐发现，康有为语多自夸自扬，梁启超早期对老师又倾向于盲从盲信，使得这种“历史知识”多为主题先行，很多重大而复杂的事件过早给出了结

论。这些结论所依托的史实在匆忙中搭建,根基不深。

茅海建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获无数。他新近撰写的《戊戌变法的另面——“张之洞档案”阅读笔记》一书,以留档至今的大量电报为基础,考索张之洞与朝廷、同僚、友朋之间的奏折函电(许多属于当时的高层秘密),梳理张与康梁等人的关系演变,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戊戌变法玄机的幽深侧面。

他告诉读者,张之洞晚年获授军机大臣之前近10年,有过一次进京辅政的机会,“而那次时机,恰在影响百年中国进程的戊戌变法前夜”。

身在武昌,以儒臣之心忧怀天下

张之洞是那个时代官场上的特例,茅海建说。张有着极高的天分,这种天分使得他在极为狭窄的科举之途上脱颖而出,又在人才密集的翰林院中大显才华。他深受传统经典的浸润,成为光绪初年风头十足的清流干将。他尊崇曾任同治帝师傅的清流领袖李鸿藻,使得自己“朝中有人”。他与曾国藩、李鸿章以军工封疆不同,纯以文章而发达封疆。他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慈禧太后青睐,从殿试名次的提前,到地方大员的出任,以及人生数次关键时刻,“慈恩”总是或显或隐。

张之洞的历史舞台主要在湖北。1889年至1907年他担任湖广总督。他在湖北深耕密织,创办汉阳铁厂,首设警察,多项“洋务”创下全国第一。虽是地方官,然而张之洞以儒臣之心而忧怀天下,时刻关注天下学术与思潮。他广致人才,梁启超、章太炎、辜鸿铭、黄遵宪等时代俊

杰莫不或慕名或受邀前来武昌,与他深谈浅晤。他门生故吏半天下,幕中多有新派人士,为众多有志于社会与政治变革的士子官员所瞩目。他擅长处理涉外事务,就连京中守旧派人士也赞他“在湖北晴川阁上宴俄太子,礼仪不卑不亢”。

辜鸿铭曾有英文著作状写张之洞在武昌思考中国时局的生动写照:

“在这最危急的关头,张之洞要扮演一个非常困难的角色。我曾经出席过张之洞总督召开的一次幕僚议事会,讨论如何对付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问题。这个议事会在武昌棉纺厂的顶楼召开。我至今记得老总督在月光下来回踱步的情景……”

光绪十九年正月,朝廷有大理寺卿弹劾张之洞,罗列四大罪状:怠慢政务、重用恶吏、滥耗钱财、总督衙门被毁不报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这些用语大体属实,张之洞起居无时,常常下午入睡,晚上十点起来办公。他个人好恶重,好大喜功,花钱如泥沙。但是茅海建认为,张之洞的事业大多是传统社会没有先例的,先行者自然会多走弯路,多付学费。

赞同变法,但反对康有为主导

张之洞短暂署理两江总督期间结识康有为,与康有过数度深夜长谈。那时他的一个儿子因赏月觅诗不慎落水淹死,家人朋友劝他多找人聊天缓解悲痛。最初他很赏识康有为的才华见地,康发起强学会,他筹款 1500 两白银支持创办《强学报》,其中 500 两是自己解囊。

但在《强学报》创刊号中,康有为的做法引起了张之洞极大不快:康

有为在刊物中大量刊发自己的学术文章；刊发不能公开的光绪帝“上谕”，并用旁注文字自诩自重。更“令人骇异”的是，刊物首页以“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”的方式纪年，擅自“奉正朔”。这在现代国家也不合规程。《强学报》只办了三期即被张之洞叫停，两人渐行渐远。

随着梁启超因《时务报》声名鹊起，康有为《孔子改制考》等书刊行，康梁影响力剧增。光绪二十三年冬，康有为进京，政治上就要一展身手。张之洞对他们由警惕转向担忧。他认为康所主张的“平等、民权”，“一万年做不到，一味呓语”（他们两个所理解的平等、民权，均与现代政治概念相去甚远）。

但张之洞毕竟是新派人物，从未向康有为“公发难端”。他不反对变法，只是希望来一场没有康有为的变法。为阐明自己的政治与学术思想，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，戊戌年）春主持撰写《劝学篇》，一是针对康有为的“邪说”，二是针对保守官员的“迂说”。书多变法主张，经光绪帝推广产生了巨大影响。

茅海建指出，这部写于变法前夕的《劝学篇》，因间有“非康”言论，清廷清算维新派时反助张之洞“免议”。

召京又折返，历史空留遗憾

就在“百日维新”前夕，清朝中枢有过一项重大政治举动，召湖广总督张之洞入京辅政。这一动议差点成为现实。

甲午战争爆发，慈禧太后在朝野压力下再度起用恭亲王奕訢，重领军机处和总理衙门，然奕訢一切以慈禧太后的旨意为归，寿日无多。翁同龢任

户部尚书、军机大臣、总理衙门大臣,加上他是光绪帝的老师,地位大升。因此,在慈禧太后及一班老臣眼中,一旦恭王去世,将无人制约翁同龢。

在此背景下,戊戌年三月二十九日,大学士徐桐出奏“请调张之洞来京面询机宜”,慈禧足足思考了三天。这是一个重大决定。张之洞接旨后一头雾水,四处打听“两宫”真实意图,知道自己入京后“或有大用”,却高兴不起来,推诿迁延,光绪帝则严词催促。

张在惴惴不安中上了路。人在途中,沙市招商局更夫与湖南船帮发生械斗,船帮放火点着了海关,延烧到日本领事住宅。光绪帝下旨,着张之洞回归本任处理。有迹象表明,翁同龢对此旨出台施展了手段。此后北京政情大变,奕訢去世,慈禧起用王文韶、荣禄、刚毅等人取代翁同龢,电告张“毋庸来京陛见”。

茅海建感叹,如果不是沙市事件突发,翁同龢不从中阻挠,张之洞应于戊戌年四月初(月底变法开始)到达北京。如果他辅政,必不会听命于翁同龢,这是慈禧太后等保守派人士乐见的。他可以成为政治上的牵制力量。翁和张两人只是政策分歧,并无不可解的恩怨,也许会互为推重,形成政治平衡。张将阻止康有为一派的冒进和保守派的反动,清末新政或提前实施。

然而,历史没有“如果”。戊戌变法按照历史呈现给我们的图景匆忙展开。一百多天后,政变到来,血腥跟进。

张之洞不一定最有实力,但他极具远见

读+:张之洞与康有为,从交谊竟至决裂,这能说明张保守落后吗?

茅海建：以前的历史观念，在谈到戊戌变法失败原因时往往把责任归咎在改良上，认为改良太过温和。戊戌真相却恰恰相反。政变之所以在变法短短一百零三天后爆发，问题就在于康、梁、谭等人做法和态度太过激进，甚至是冒进。康有为等人明知光绪权力有限，急忙忙在权力中心安插自己人，排挤异己，刺激慈禧。

戊戌变法是在慈禧太后全程监控下进行的，没有她的支持，新法一天也推行不了。现在史家证明了，光绪帝在接见日本下野首相伊藤博文时，并没有提出要延聘他主持变法新政，“主权委于外人”。但是，维新百日里他们的鲁莽举措的确不少。政变发生后，康有为在境外接受记者采访，出示经他窜改的光绪帝“密诏”，将帝后矛盾公之于众。这种做法陷光绪帝于危险境地，那时慈禧太后已有废帝再立之心，刘坤一等大臣正为保全光绪帝竭尽全力，康的做法却是为险情火上加油。

康有为的敌人不仅仅是极端保守派，很多主张改革的人都对他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。张之洞只是其中一个。

读+：张之洞对康有为和梁启超二人的看法有区别吗？

茅海建：有很大区别。梁启超第一次去武昌拜访张之洞，还只有24岁。那天张恰好娶侄媳妇，贺客盈门。张撇开宾客，专门与梁相见，拉了最亲的亲信陪同，宴至二更，许以优厚职务和年薪。我看了那么多“张之洞档案”，感觉这是他待人的最高优礼。但是梁启超很有自己的判断力，反觉得张“其辨过于伍”，以要办《时务报》辞之。张之洞不以为忤，一遇到机会，还提醒别人要对梁优礼有加。

后来张之洞越来越反感康有为的思想，对梁启超遵奉其师的做法不以为然，但仍有意做梁启超的工作，等待他改变态度。

读+：怎么看待张之洞戊戌变法前后的表现？

茅海建：首先我们要看到他是一个普通人，你看他被召入京辅政时，那种畏首畏尾、拖延抗拒，那种害怕揽事、害怕进入政治漩涡的心态。他深知京城政治生态复杂，不像我们觉得入京辅政是天降大任，他首先想到的是自身安全。

戊戌政变发生后，张竟私下指责昔日的朋友黄遵宪是“康党”。“康党”在当时气氛下是很严重的罪名。黄遵宪很早就与张有过从，张曾经为黄的仕途铺过路。后来黄遵宪在奉旨处理《时务报》纠纷时，表现出心向康梁的一面，张之洞就此不能再原谅他。政变后有人想推举再用黄遵宪，征求他的意见，他用“钻营嗜利，险狠鄙伪，毫无可取”这样刻薄的词语形容黄遵宪。当然，人是复杂的，我们不能因为哪一句话哪一件事就给人下定论。

读+：我们今天该如何恰当看待张之洞的思想成就？

茅海建：我个人以为，张之洞是中国近代的转型人物，其在《劝学篇》中表现的“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”的文化观，恰是那个转型时代最有实践意义的理念。思想家可以超越他的时代而指引后来者，政治家则必须坚实地站在时代给他搭建的舞台上。对政治家来说，任何一种轻率的超越都有非常大的危险。张之洞毫无疑问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，但不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思想家。他也毫无疑问不是那个时代最具实力的政治家，但又是最有远见的政治家。

戊戌变法仍有巨大谜团

读+：戊戌变法失败后，张之洞大致是怎样的心态？

茅海建：一方面，不得不承认，他还是有些暗自高兴的，因为他一直所忧惧所反感的康有为失败远走，翻身似再无可能。另一方面，他还是很悲痛的，因为他的得意门生杨锐被杀。他曾经张罗营救，但是终归无济于事。

读+：你治戊戌变法史，觉得哪些史实搞清楚了，哪些还有很大疑问？

茅海建：首先，我认为戊戌政变是一个动态而非预谋的过程，它由相关的诸多事件组成，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政治权力关系经历了紧张、对立、决裂，最后发展到慈禧企图废帝。其中若要明确一个具体的时间，仍是八月初六日。其次，我认为政变初起于七月十九日光绪帝未依当时的政治游戏规则，即未先请示慈禧太后，而是独立地决定罢免礼部六堂官。我们还注意到，光绪帝召见和提升袁世凯，似未引起后党激烈反应。戊戌政变并不是因为袁世凯告密而引发，但袁世凯告密的消息传到北京，大大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。

我这些观点，都是前辈已经作过的结论。我的贡献在于从细部上清晰了戊戌政变的整个过程，做了一些确认、补证和修正。

我要强调的是，慈禧太后为什么在八月初五决定将颐和园的日期推迟到初十日、为什么初六日亲政，这其中还缺少扎实的证据链，很多专家考证在我看来还站不住脚。对于我来说，这些依然像谜一样缠绕着我的心。这个谜底很可能藏在两位身居要职、知悉内情且有写日记习惯的大臣的日记里，他们一位是张荫桓，一位是王文韶。他们的日记迄今都还没被发现。

读+：你觉得一个民族对待自己历史的最好态度该是怎样的？